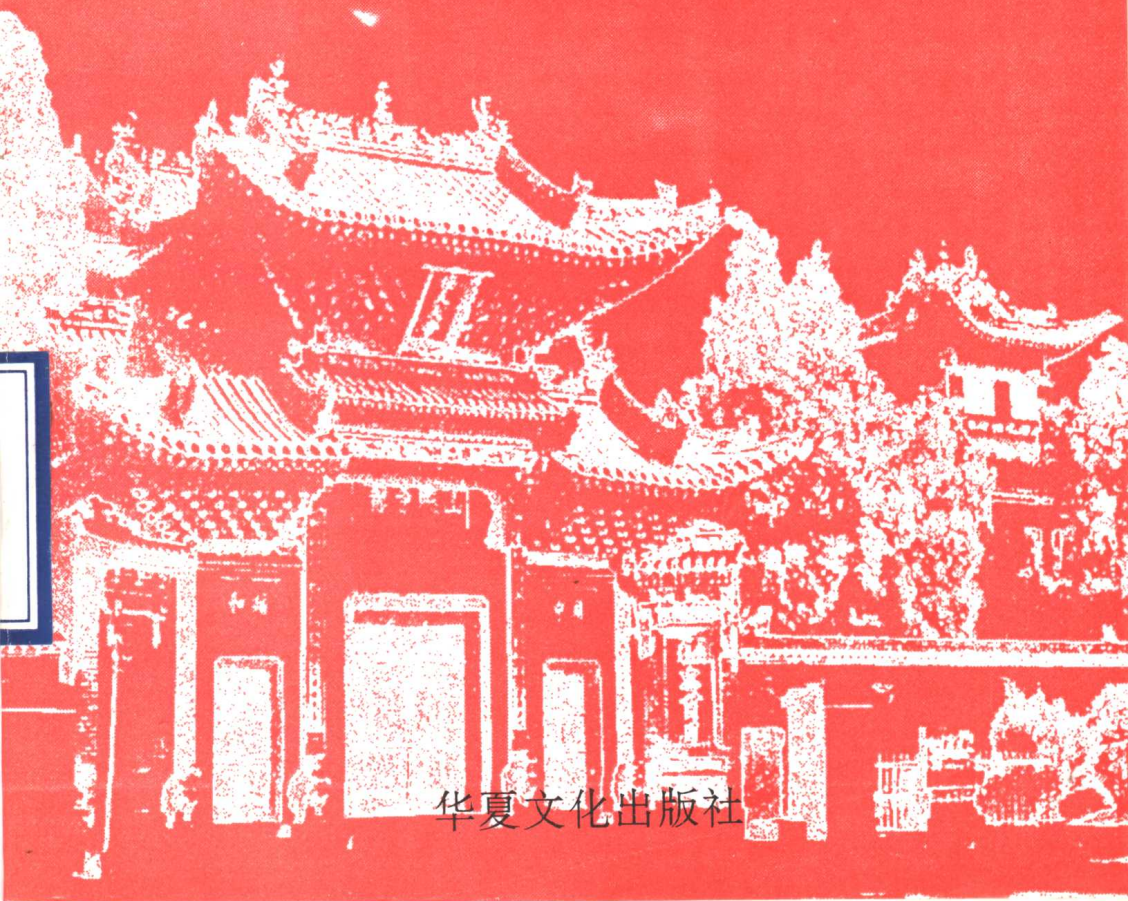


中国会馆

陈清义 编著



华夏文化出版社

中国会馆

陈清义 编著

华夏文化出版社

中国会馆

陈清义 编著

*

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

北京华联印刷厂印制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5.625 印张 141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

ISBN962—450—20694122—4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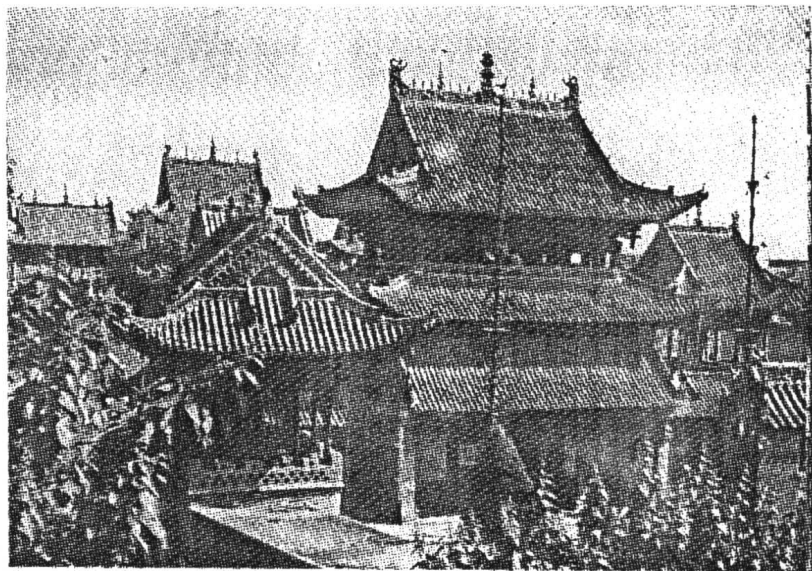
定价:12.00元



聊城山陕会馆大殿



烟台福建会馆



社旗山陕会馆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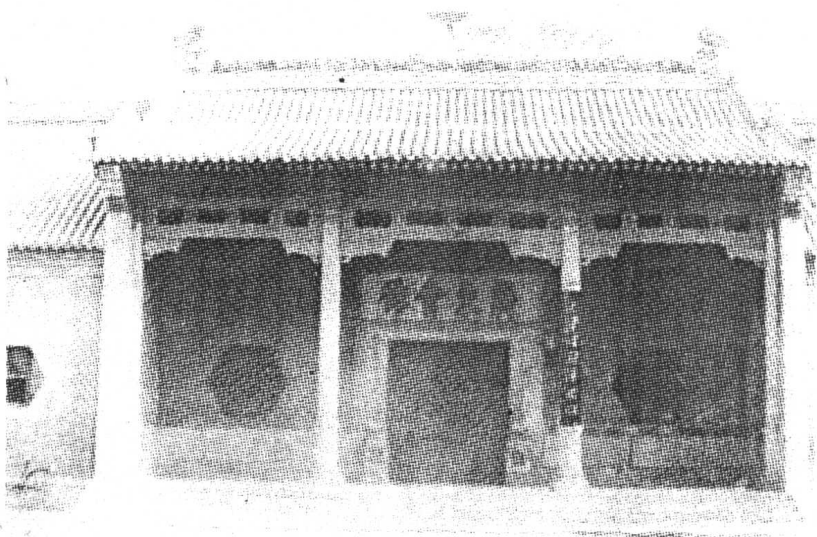
苏州全晋会馆占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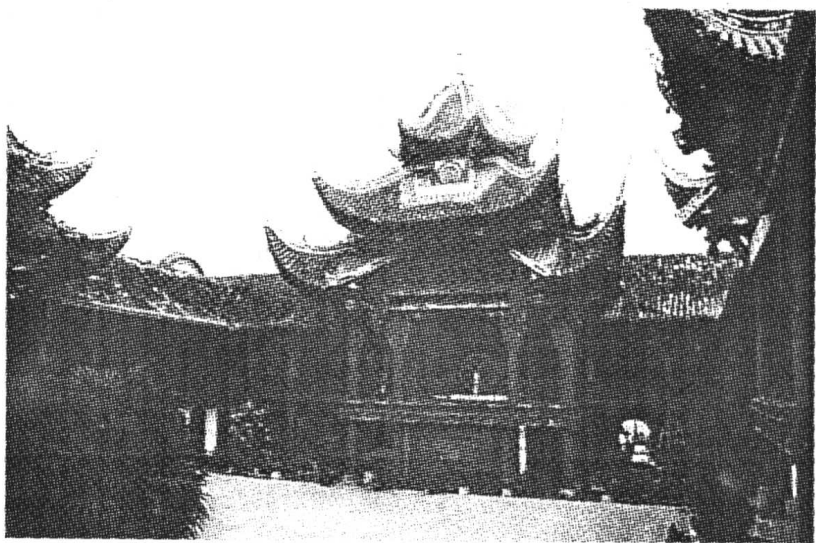
开封山陕甘会馆



粤东会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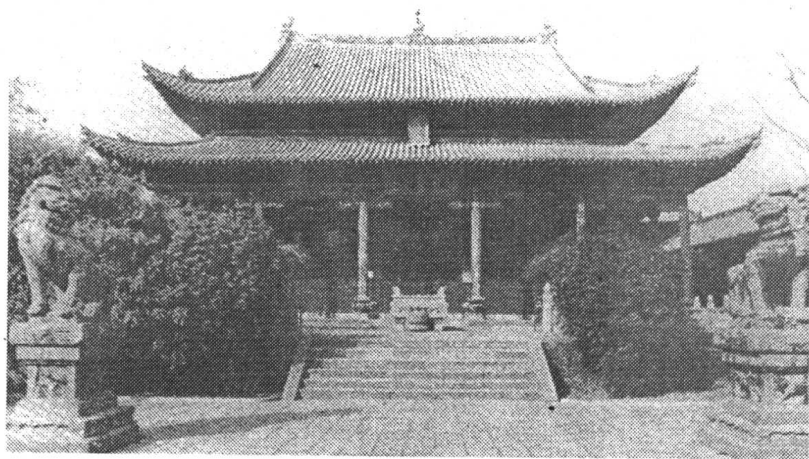
天津广东会馆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戏楼



盐商会馆春秋祠



潞泽会馆大殿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会馆探源	1
一、会馆的含义	1
二、会馆溯源	3
第二章 会馆的发展历程	5
一、形成阶段	5
二、繁荣阶段	7
三、蜕变与衰微阶段	32
第三章 会馆的分布	33
一、从区位看会馆分布	33
二、从地域看会馆分布	45
第四章 会馆的作用和功能	47
一、祀神	47
二、合乐	49
三、义举	52
四、公约	55
第五章 会馆的形式和种类	58
一、官绅会馆	58
二、科举会馆(试馆)	59
三、工商会馆	61
四、移民会馆	64

五、殡葬仪馆	67
第六章 会馆的管理	69
一、科举会馆的管理	70
二、工商会馆的管理	86
第七章 会馆的文化内涵	101
一、会馆的建筑设置	101
二、会馆的建筑特色	106
三、会馆建筑的文化意蕴	112
四、会馆的神灵设置	117
五、会馆的神灵崇拜	122
第八章 中国会馆选介	126
聊城山陕会馆	126
社旗山陕会馆	132
烟台福建会馆	136
洛阳山陕会馆	137
洛阳潞泽会馆	141
天津广东会馆	143
自贡西秦会馆	144
北舞渡山陕会馆	145
苏州全晋会馆	145
郟县山陕会馆	146
上海三山会馆	146
上海四明公所	146
上海潮州会馆	147
上海泉漳会馆	147
上海钱业会馆	148

上海徽宁会馆	148
北京南海会馆	148
北京仙城会馆	149
北京泉郡会馆	149
北京延邵会馆	150
北京安溪会馆	150
北京江夏会馆	151
北京湖广会馆	151
北京河东会馆	152
北京浮山会馆	153
北京平遥会馆	153
北京平阳会馆	154
北京正定会馆	154
北京潼川会馆	154
北京安徽会馆	155
多伦山西会馆	156
汉口山陕会馆	157
百色粤东会馆	157
参考文献	158
后记	164

第一章 中国会馆探源

一 会馆的含义

会馆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与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而且科举制度的盛行、移民的增多也为会馆的产生、健全奠定了基础。然而,何为会馆,其基本含义如何?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阐述,现列举如下:

韩大成先生认为:“所谓会馆,系寓居异乡城市中同一乡贯的官绅商民所建的馆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由于商民经济不断发展,外出商民不断增加与城市中土著非土著矛盾日渐加剧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组织”^①。

吕作燮先生认为:“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发展于明朝中叶嘉靖万历时期,并逐渐在全国的通都大邑兴起,清朝已达到了它的兴旺时期,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就会有会馆的出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研究明清历史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结构”^②。

李华先生认为:“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年过节或每月之朔望,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北京是全国的心脏,皇室贵族以及各地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集聚在这

①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② 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载《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里,并竞相成立会馆”^①。

何炳棣先生认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它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②。

王锐先生认为:“会馆的‘会’,是聚合的意思;‘馆’,则是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意为‘聚会寄居的场所’。最初,会馆主要是为各省参加上京会试的‘举子’们解决食宿而开办的,故称‘会馆’。它一般多因科举中第者为不忘昔日赶考寄寓之艰难凄凉,联络同乡京官及旅京客商合力出资购建的”^③。

王静、许小牙认为:“会馆,是出现于明末,盛行于清代前期的一种地方乡土性的商人组织。它原是同乡人在外埠的寄居场所,由乡绅集资筹建。其主要活动就是‘捐募基金,以共襄善举’”^④。

王兆祥、刘文智先生则认为:“会馆是由流寓客地的同乡人所建立的专供同乡人集会、寄寓的场所。会馆的出现是很早的,但不叫会馆,也不是由商人组建的。其发生与科举制度有很大关系”^⑤。

也有人把会馆的存在与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等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有人把会馆分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⑥。也有人认为会馆可以是同乡组织,但也可以是同行组织,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象征,商人在会馆设置中有重要作用,甚至试

①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前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1页。

③ 王锐:《市井商情录——中国商业民俗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④ 王静、许小牙著:《掇客·行商·钱庄——中国民间商贸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13页。

⑤ 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商人》,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6月版,第67页。

⑥ 加藤繁:《清代的北京商人会馆》,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第101页。

馆亦然。^①

以上所述,均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会馆的含义作了不同界定和概括。并各有侧重,各有其合理的成分。笔者认为,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同乡或同业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基本功能,并以多种形式和不同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

二 会馆溯源

关于会馆溯源问题,方家多有考证,或曰两汉,或曰宋元,或曰明……不一而足,众说纷芸。

《汉书·朱买臣传》载:“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②。

《后汉书·史弼传》曰:“又前孝廉魏劭毁变形服,诈为家僮,瞻护于弼。弼遂受诬,事当弃市。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③。

以上两书所言的“郡邸”,北京胡春焕、白鹤群先生认为“郡邸者,即今之会馆也”^④。周寿昌认为:“汉代的郡邸是安置每年入京上计官员的所在,其中言及郡邸的出卖当视为公产的临时变通做法”^⑤。何炳棣先生则认为,汉时的郡邸决非明清会馆式的私人同乡组织,而更宜视作各郡驻京的办事处。^⑥

① 寺田隆信:《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载《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61—582页。

② 《汉书·朱买臣传》卷六十四上,中华书局出版,第2792页。

③ 《后汉书·史弼传》卷六十四,中华书局出版,第2108页。

④ 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第1页。

⑤ 王日根:《乡土之链》,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0页。

⑥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2页。

而王日根先生认为：“明代以后出现的会馆与过去的郡邸、进奏院、朝集院并不具有源流关系。汉代的邸舍等为官设机构，而明以后的会馆则纯属私设，属民间结社。这也许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央集权比较直接而后期中央集权日显间接化的趋势相吻合，前期的邸舍包含了后期的会馆的基本功能，但后期会馆则显得更加灵活，更有活力，更能适应形势的变迁，也更能广泛的空间发挥作用”^①。

《闽中会馆志》卷首《程树德序》中载：“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其制亦稍异于前矣”。《闽中会馆志》卷首《陈宗蕃序》也云：“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恤寒莩而启后进也。”

终上众家之言，笔者认为，会馆作为一种民间社会之组织，就其功能、所有权以及社会性而言，汉代之郡舍绝非明清之会馆。会馆始于明初，似乎更可确信。

① 王日根：《乡土之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第二章 会馆的发展历程

会馆作为民间私设社会组织,自从明初开始出现,经历了明中后期,在清前期达到鼎盛与繁荣,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消失,又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继续勃兴,呈现出其独特的发展动态,并含有其固有的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演变,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 形成阶段

从明初到明中叶,可以看作会馆的形成阶段。

据民国《芜湖县志》卷 13《建置》载:“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据目前所掌握资料,这也许是会馆创建最早的记载了。

“俞谟,字克端,永乐元年选贡,任南京户部主事,转北京工部主事。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买自路姓者,归里时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正统间路姓后人构讼争地,谟子日升持契入质,归芜湖会馆。至今公车谒选胥攸赖焉”^①。

从上面资料内容可以看出,俞谟作为一个芜湖籍京官,自购基地一块,营建馆舍,文中虽未言及其具体用途,但我们不难分析,其功能或为亲朋寓居之所,或为同乡之人会聚之地。当他辞官回乡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籍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这实际上芜湖京官已形成一个同乡团体,势必利于芜湖各界人士旅京活动。它没有正式的规制,也没有顾及其后的维持办法,此时会馆的存在,仅

^① 民国《芜湖县志》卷 48《人物志·宦绩》。

仅是满足旅京宦宦共叙乡情乡音和满足于一小部分旅京同乡之人的生活之便。这也许便是会馆形成之雏形。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一些地方官绅依照芜湖京官的做式，纷纷购置基地建设会馆。如江西浮梁在京师的会馆位于“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面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舜鼎建，曰浮梁会馆”^①。又如广东会馆由“永乐间王大宗伯忠铭、黎铨部岱与杨版曹胪山所倡建……厥后会馆改建于达摩厂”^②。诸如此类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师蓬勃而出，并以民间自助的形式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清初周亮工在《闽小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件福建会馆的轶事：

“武宗时，闽僉宪林公文缙赴京谒补。舟抵潞河，适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缙俯伏船头，上鞭指之曰：汝何从之？随入舟。时文缙家戚匿舱下，止一婢抢缙六岁儿立舱中。上问曰：此何人？缙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当与朕为子。缙奏曰：恐臣子无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携之。时护跸人至，踉跄促去。儿入宫，思父母，日夜啼，百计诱之终弗止。文缙亦入都，与素识大珰谋，欲出儿，珰乘机奏曰：此儿诚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寄养，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作说客耶？如再蹄，当弃之水。珰惧，亟与文缙谋，觅善泅者伏河侧。儿啼不止，上果弃之河中。泅者故拉儿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儿僵矣。文缙抱哭不已，久之始苏，文缙补官岭南，亟携儿去。不久，又休致归，杜门课子，二十一岁举于乡，又四年成进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宫人，前婢亦在列。婢无归，问闽绅姓名，人谓须至福州会馆。询乃得，婢至馆，问有林坤否，时璧适在寓，以为询己也。急出应，及见，婢曰非公，我所询者老年人，问何名，曰林文缙。璧大惊，曰此我父也，汝何从知

^① 乾隆《浮梁县志》卷7《建置志》。

^② 同治七年邓华熙《重修广东旧义园记》。